

克里斯瑪權威的困境： 寧夏文革武鬥的起源

• 武麗麗、趙鼎新

毛澤東雖然有能力發動文革及在一定範圍內改變其動態，但是他卻沒能使文革向着他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文革中各級黨委被打倒，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個更為廉潔的政權；被發動起來的百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大多數人卻把這種自由用於整人和派性鬥爭。

對於文革的發生和發展的解釋，很難忽略毛澤東的獨特作用^①。文革是由毛一手發動的，只有毛才有能力打破各級黨委的控制，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也只有毛才有能力在文革的各個關鍵時刻不斷改變其航向，駕駛着中國這一左衝右撞的巨輪，直至其去世。毛雖然有能力發動文革及在一定範圍內改變其動態，但是他卻沒能使文革向着他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文革中各級黨委被打倒，但是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個更為廉潔的政權；被發動起來的百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大多數人卻把這種自由用於整人和派性鬥爭。在毛去世時，中西方所有的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都完全被邊緣化，置對方於死地的惡性權力鬥爭成了中國的主流政治文化，國人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十年文革的確是一場浩劫。

本文從1966至1968這三個關鍵年份銀川地區的文革入手，試圖闡明以下問題：為甚麼以毛的能力和威望，他只能發動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發展形態的內在邏輯是甚麼？為甚麼文革必然會把中國迅速地引向災難？寧夏地處西北且不屬於一個重要省份，人們可能因此會對銀川文革的典型性問題提出質疑。事實上，從本文的討論中可看出，銀川文革與其他地區相比，有着十分相似的問題和發展階段。此外，中共對銀川文革的表態較一些重要省份來說有着一定的滯後，這就給了銀川的地方官僚勢力和群眾組織更多的活動空間。本文將從毛澤東的克里斯瑪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地方官僚和群眾組織這三者的關係入手來解答以上的問題。銀川地區的文革對以上問題來說是一個合格的素材。

* 本文第一作者於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間在銀川收集了該地區文革期間的大字報和檔案資料，並對身份不同的五十名文革參加者進行了採訪。我們的調研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韋伯提出的克里斯瑪權威和例行化 (routinization) 是本文的兩個核心概念^②，有必要作簡要說明。克里斯瑪權威指的是建立在對個人超常品質和其所體現的特定使命信仰基礎上的權威。韋伯認為，克里斯瑪權威因其個人性而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權威 (科層權威 (bureaucratic authority) 或傳統權威 (traditional authority)) 取代，這就是例行化或制度化。在韋伯看來，克里斯瑪權威和任何例行化權威，特別是科層權威，是根本對立的。這是因為克里斯瑪本質上是一種反日常結構和日常工具理性的力量，而後兩者則是科層權威的特徵。韋伯的論點是建立在理想概念 (ideal-type) 基礎上的，而現實政治的權威基礎往往是混合型的。毛時代中國政府是由克里斯瑪型領導 (毛) 和其控制下的科層機器 (各級黨政軍機關) 組成。毛的克里斯瑪權威及其意識形態構成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來源，科層體制則是毛統治社會的必要工具，而這科層體制的權威來自毛的克里斯瑪權威的例行化。

克里斯瑪是個人性權威，而科層是制度性權威。科層運作需要規範和程序。這種對於可控性的追求勢必使科層運作變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趨於保守，與克里斯瑪型領導的激進性形成緊張，並會在無形中削弱克里斯瑪權威。歷史上，克里斯瑪型領導一般都會在其有生之年對科層權威採取限制措施，以維護自身的領導^③，但是他們並不試圖徹底改變克里斯瑪的例行化傾向，因此克里斯瑪型領導和科層之間尚能共處。但是毛澤東顯然不是這樣的人。文革前，毛與科層之間的各種衝突，比如毛偏好命令型經濟 (克里斯瑪在經濟發展領域的運用) 而科層追求理性計劃經濟，最後往往以毛在實踐上的失敗而告終；毛同時也對中國革命在科層領導下的迅速例行化十分不滿。這就造成了毛的個人權力失落感和對其所依賴的科層的革命性的懷疑。從本文的視角來看，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想藉「繼續革命」的方式來克服科層的例行化，從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瑪權威及其意識形態的革命性。

科層體制的權威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化身毛澤東本人。因此面對文革的衝擊，中共的巨大科層顯得非常無力。正如文革前毛與劉少奇在一次爭執中所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④但是，毛發動文革卻遇到了如下的困境：第一，文革的鬥爭對象是科層體制，因此毛不可能依賴科層來進行這一場革命。他必須發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但是，群眾不可能是毛的意志的化身。他們有着在文革前與地方科層的恩恩怨怨，有着對文革的不同理解和對毛的不同忠心程度，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權力欲。因此，群眾在文革中的行為與毛的希望大相逕庭。毛很快便意識到，由於群眾的利益和觀念的多樣化，以及群眾運動的反例行化特性，群眾組織要比科層更難駕馭。第二，雖然文革的對象是中共科層，但毛並不認為他參與創建和正在領導的黨已經是漆黑一片。文革的目標是「揪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產生了第二個難題：到底誰是走資派？除了早就想除掉的劉少奇外，毛對於這一問題並不清楚。這就有了如下後果：科層中不同派系把對方視作走資派拋了出去；群眾把自己憎惡的幹部標記為走資派；群眾組織頭目和某些科層幹部相互勾結，以打倒另一些幹部和群眾。中國於是成了一個霍布斯的世界，擁有「大鳴、大放、大

毛時代中國政府是由克里斯瑪型領導 (毛) 和其控制下的科層機器 (各級黨政軍機關) 組成。科層體制的權威來自毛的克里斯瑪權威的例行化。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想藉「繼續革命」的方式來克服科層的例行化，從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瑪權威及其意識形態的革命性。

辯論、大字報」自由的人們，在人人自危的狀態下捲入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派性鬥爭。第三，中共的科層負有保衛和管理這一國家並為大眾提供基本服務的責任。除非毛真的想「再次上山去打游擊」，否則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他也希望國家的一些基本事務能得到處理，而這一願望必須通過科層得到實現。這就是說，即使是在各級科層受造反群眾衝擊最為兇猛的時候，毛仍然需要依賴科層來管理這一國家。毛能把科層中的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卻不能把整個科層一鍋端。中共科層的國家機器功能給了科層一定的自主性。在許多情況下，由於毛中央的信息不靈和顧不過來，更由於毛有着種種投鼠忌器式的顧忌，各級文官和軍事科層往往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混亂的派性鬥爭中，把文革的發展方向進行對自己有利的、有限的制度化或例行化。

毛的克里斯瑪權威和以上的三個結構因素的耦合決定了文革的發生和發展：科層無法阻止毛發動文革，但是造反群眾和各級科層卻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轉化為合法性符號並對其進行挪用。這種「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獨立於毛的意志之外的發展邏輯。毛可以在任何時候利用他的克里斯瑪權威發出指示以改變文革方向，但是毛卻無法阻止自己的話語被各種力量利用，將文革導向毛所不願見的方向。於是，當毛覺得社會太混亂而發出向「右」轉的指示時，科層勢力抬頭，造反派受壓，社會走向保守的例行化方向；而當毛發出向「左」轉的指示後，反例行化的造反組織就會抬頭，科層勢力受限，社會則走向混亂。文革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的左右搖擺中變得日益不可駕馭。在銀川地區，這種混亂的加劇，迫使毛在1967年不得不用他最後所能依賴的野戰軍軍事科層來整合局面。但是，野戰軍一經起用後，其運作邏輯與舊地方科層相差無幾：造反派受壓、科層權威重新確立、一個新的例行化過程啟動，毛最終敗於一個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識形態沉重、派性鬥爭不斷的科層權威手上。可以說，韋伯打敗了毛。以下，我們將以這一理論框架為指導，對銀川地區文革的興起和發展進行描述和分析。

科層無法阻止毛發動文革，但是造反群眾和各級科層卻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轉化為合法性符號並對其進行挪用。這種「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獨立於毛的意志之外的發展邏輯。

二 工作組和保守紅衛兵——科層對克里斯瑪動員的控制(1966.6-9)

銀川地處邊緣。當北京文革已發展得轟轟烈烈時，寧夏還在搞社教運動。寧夏自治區黨委把文革作為社教的延續。各單位社教團直接領導文革，他們建立黑名單，把黑五類和其他有歷史問題的人，劃成右類並進行批鬥。

北京文革的消息通過報紙和電台傳到了銀川。1966年6月2日，在聶元梓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社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影響下，寧夏大學的九名學生貼出了一張「檢查我校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狀態」的大字報^⑤。該大字報的內容純屬模仿，其策劃人只是學生幹部和積極份子，然而這行動卻震動了寧夏區黨委。依據慣例，區黨委向寧大派出了調查組並對學生進行嚴密監控。同時，寧大組織學生對大字報的作者進行了批判，把他們定性為「反黨份子」^⑥。

6月4日，按照當時劉少奇所發出的中央指令，區黨委派出工作組進駐銀川各校領導文革。工作組將運動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當北京高校領導被大量打倒時，寧大領導得以暫時免於此難。6月中，毛下令全國學校停課半年鬧革命，

寧大學生變得更為興奮。18日，一張批判寧大黨委書記江雲的大字報出現在《寧夏日報》社門口。區黨委第一書記楊靜仁一方面命令工作組迅速制止這種行為，另一方面明確宣稱「江雲不是反黨份子，寧夏大學不是北京大學」。同時，他們派江雲到西北局開會以躲避衝擊⑦。

寧夏文革工作組把運動的矛頭指向教師和下層幹部。6、7月間，以寧大為例，83%的老師和下層幹部遭到了大字報的批判，42%的教師和59%的幹部劃為壞份子被批鬥⑧。某些工作組還把鬥爭矛頭指向學生。銀川一中高考準備班(高三班)的大部分學生出身於非紅五類家庭，工作組把他們定為「資產階級的小苗苗」加以批判。這種做法惹怒了班裏出身紅五類的幹部。於是他們就在中央媒體輿論的影響下組織了「保衛校園」的反工作組行動。該行為被區黨委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學生們被遣送到郊區農場進行整風⑨。自反右運動後，各級黨組織的權威成了神聖。它們從毛那裏獲得了制度克里斯瑪權威，因此「進攻工作組就是進攻寧夏區黨委，進攻區黨委就是進攻毛主席和黨中央」⑩。在這一例行思想影響下，地方科層對學生造反的自然反應就是鎮壓。這些文革初期的犧牲品大多數都成了以後造反派的骨幹。

進入7月下旬，科層權威對文革的控制遭到了毛的批判。毛反覆批評了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是犯了路線錯誤，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鎮壓無產階級革命」，並勒令撤銷工作組。此後毛開始拋棄科層中介，以個人名義直接與群眾發生聯繫。他的眼光投向清華附中自發學生組織紅衛兵。毛寫信盛讚他們的革命性，並把他們的大字報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正式材料在會上頒發。8月8日，在毛的操縱下，大會通過了「文革十六條」，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撤銷工作組和通過十六條使群眾感到這次運動與以往不同：它的鬥爭對象不是群眾而是黨的領導階層。8月18日，毛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了紅衛兵，從此紅衛兵運動風靡全國。

然而，這一切並未徹底打破各級科層對文革的控制。工作組撤離學校後，取得文革領導權的是寧夏區黨委一手扶植的文革籌備小組。當然，迫於形勢，區黨委也改變了一些策略：他們為因反工作組而受壓的學生平反，並拋出了與寧夏一二把手楊靜仁和馬玉槐不和的幾位幹部作為「寧夏區黨委內的黑幫黑線」進行批鬥，其中包括區黨委書記、政府副主席吳生秀，區黨委常委會副主席劉震寰和文化局副局長楊辛⑪。

在區黨委的控制下，銀川成立的「紅衛兵總部」只允許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參加，其頭目也都是區黨委和軍區領導的子女。他們熱衷於「破四舊」，並對種種針對他們父輩的造反行為進行壓制。十六條發布後，銀川的工廠和政府機關裏出現了一些零星的反單位黨委領導的行為，但是如同當時的學生造反一樣，這些行動馬上就被扣上了反黨反革命的帽子。直至9月底，銀川文革基本被控制在制度軌道內。

毛反覆批評了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是犯了路線錯誤，並勒令撤銷工作組。此後毛開始拋棄科層中介，以個人名義直接與群眾發生聯繫。群眾感到這次運動的鬥爭對象不是群眾而是黨的領導階層。然而，這一切並未徹底打破各級科層對文革的控制。

三 串聯紅衛兵和科層的失控

如果說毛與紅衛兵的直接接觸，是打破中共中央科層對文革控制的關鍵，那麼毛發起由國家負擔經費的串聯，則是一個打破地方科層對文革控制的有效

手段。在毛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北京文革迅速朝着毛的意圖發展。但是在「天高皇帝遠」的銀川，地方科層卻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威將運動引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串聯開始後，北京的造反信息迅速擴展。北京紅衛兵因其政治優越感，加上與地方上的權威沒有任何關係，行為極為大膽：他們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地方的最高權威，幫助或直接組織了原本力量很薄弱的地方造反派，並為地方造反派提供了行為模式。

最早到達銀川的是蒯大富手下兩個出生於寧夏的清華學生。他們到達銀川後立即試圖在自己的母校建立造反組織^⑫。8月下旬，一批來自北京第三十和五十五中學的紅衛兵到達銀川^⑬。他們一進銀川就把攻擊寧夏區黨委的大字報貼到區黨委門前，並要求楊靜仁出來接見。北京的紅衛兵是「毛派來的革命小將」，楊靜仁只得親自出來歡迎，並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做了謹慎的回答。北京紅衛兵的行為在銀川造成了極大的震動：銀川極少數造反者的眼光還僅僅局限於本單位的領導，北京紅衛兵的行為使他們意識到連區黨委都是可以挑戰的。第二天，在北京紅衛兵的指引下，本地學生開始在區黨委門前貼出大字報，如「毛主席派來的紅衛兵要挖出彭真理在寧夏的定時炸彈」、「楊靜仁已經對北京紅衛兵表示了支持」等等^⑭。

大學紅衛兵在政治上比中學生敏銳。通過北京紅衛兵，寧夏的大學生當中有人看出了文革動向與寧夏黨委的領導方向是相反的。在中共罷黜了寧大黨委書記江雲後，寧大的激進學生在9月2日召開了批江大會，並把鬥爭矛頭直指寧夏區黨委。在會上，學生指責江雲的檢查是區黨委給準備的，他們要哈炯磊（寧大工作組組長）和王釗（江的秘書）來對證。區黨委拒不給人，並否認曾包庇過江雲。激進學生於是聚集區黨委前，提出「區黨委拒不交人是為了掩藏江和區黨委之間的陰謀」^⑮。「九二行動」是寧夏學生對區黨委的第一次直接挑戰，它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反響。此後，寧大學生產生了對立的兩派，但保守派佔有絕對主導。

面對日益激進的學生，寧夏地方科層採取了進攻措施。9月12日，自治區副主席陳養山作報告稱，「寧夏的工作組並沒有犯路線錯誤，只是犯了方法錯誤；楊靜仁領導的區黨委在執行文革中採取了正確的道路」。此後，銀川大街上貼滿了攻擊寧大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批判區黨委的大字報幾乎消失^⑯。對此，銀川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的支持下策劃了更為激烈的行動。9月21日寧大激進學生組成的革命串聯隊貼出大字報，號召在25日召開「揭露寧夏區黨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會。二十多個單位的造反者對通知做出了響應，並一起組織了大會籌委會。儘管區黨委百般阻撓，大會仍如期舉行。馬玉槐、楊一木和陳養山被點名批判。會上同時也出現了如「楊靜仁是寧夏牛鬼蛇神的大紅傘」、「寧夏區黨委是黑線黑幫」、「踢開黨委鬧革命」等口號^⑰。

「九二五大會」時，由北京紅衛兵鼓動扶植起來的銀川造反派在數量和勢力的上都還很有限，他們在銀川處處受壓，而且北京紅衛兵還被驅趕，但是寧夏科層的權威已大大受損。9月底，大量寧夏學生衝破區黨委的控制去北京串聯。在北京紅衛兵的保護下，寧大串聯隊的領導最後也得以進京串聯。隨着文革在10月份激進轉向，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壯大。

毛發起由國家負擔經費的串聯，是一個打破地方科層對文革控制的有效手段，北京文革迅速朝着毛的意圖發展。北京紅衛兵行為極為大膽，為地方造反派提供了行為模式。

四 造反派興起和文官科層的瓦解(1966.10-12)

北京紅衛兵在地方受到攻擊和地方造反派受壓的情形通過串聯紅衛兵傳到中央。自9月中旬起，毛開始對在科層控制下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產生了不滿，並醞釀着運動的轉向。10月1日，林彪在國慶講話中指出文革進入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段，而資反路線的主要表現就是對群眾造反進行壓制。而後，毛召集地方領導參加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對他們處理文革的方式進行了批評。「批資反線」和10月工作會議打破了各級地方黨委在百姓中的神聖地位。在制度克里斯瑪權威被毛剝奪後，各級文官科層走向瓦解，受壓的造反派紅衛兵則迅速崛起。

銀川的發展照舊比北京滯後。直到10月中旬，寧夏區黨委仍在組織幹部和保守群眾對寧大的造反學生和「九二五大會」進行攻擊^⑩。但隨着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毛的態度日益明確，這些攻擊迅速消失。同時，寧大造反派紅衛兵正式退出「紅衛兵總部」，並組建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該組織成員標準寬泛，大量被老紅衛兵排除在外的學生加入了這個新組織。通過串聯，銀川學生的思想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正如一名紅衛兵所講，「串聯徹底解放了我的思想。看到北京那麼多高層幹部被批鬥，我感到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遍地都是。批鬥地方黨委幹部是絕不會犯錯誤的。」^⑪

進入10月下旬，區市級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在銀川形成。10月底，寧大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了一個「聯合總部」，以協調寧大的各派造反組織。不久，中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成立了自己的區市級組織。寧大聯合總部開始向黨政機關和廠礦派出串聯隊發動造反。造反派在各單位內大都是受壓的少數派，他們因此也會主動尋求造反派紅衛兵的支持。銀川文革因此從單位轉向區市層面。11月，銀川形成了以行業系統為基礎的區市級造反組織。

工人造反派的出現是當時的焦點。廠礦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如果放開對工人的限制，將會直接威脅到經濟生產和國計民生。早在9月份，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不允許工人成立自發組織和發動串聯，工人造反組織因此有着合法性的問題。11月下旬，銀川的一些工人組織要求區黨委批准其成立區市級組織並供應相應物資，區黨委則以中央九月文件的名義予以拒絕。但進入12月，隨着運動的發展，毛認為工人參加造反是文革的必然，中共中央在12月9日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批准工人在文革中自由成立組織和進行串聯。此後，銀川的工人造反組織得到了迅速發展^⑫。鑒於造反力量的迅速發展，各單位的保守派群眾也在幹部的操縱下成立了「捍衛毛主席聯絡站」這樣的聯合組織，與造反派對抗。至12月中旬，銀川群眾已充分發動起來。

與其他省市相似，銀川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成員構成上具有明顯的不同。保守派有「五多」：紅五類多，黨員多，團員多，幹部多，積極份子多。他們是文革前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則包括了從紅五類到黑五類的各種人，其中有不少是歷次政治運動中各單位的受害者或受牽連者，特別是在寧夏的「反地方民族主義」和「反壞人壞事」運動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⑬。造反派因為在本單位內處於劣勢而走向社會，但是一旦走向社會，其訴求便超出了單位內恩恩怨怨的限定，形成了超單位的訴求。但社會上的造反派並沒有真正的統一，他們有的

隨着運動的發展，毛認為工人參加造反是文革的必然，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批准工人在文革中自由成立組織和進行串聯。此後，銀川的工人造反組織得到了迅速發展。

只是在受當權者壓制時暫時聯合，一旦外部壓力消失，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和權力紛爭就會爆發。與造反派比起來，保守派的組織性和內部統一性要大得多，他們在人數上也要比造反派佔優勢。只是因為當時毛的政策偏向造反派，保守派才會在與造反派的鬥爭中佔下風。

面對造反風潮，寧夏領導只有招架之功。12月11日，楊靜仁被迫承認區黨委在工作組問題、對待群眾組織問題和串聯問題上犯了錯誤^②。15日至16日，寧大紅衛兵要求楊靜仁罷馬玉槐的官，楊含糊其詞。造反派學生決定將寧夏區黨委的領導拉到北京評判。16日下午，寧大紅衛兵臥軌攔車將馬玉槐帶到北京。中央責成楊靜仁和區黨委副書記甘春雷赴京處理馬的問題。在北京，當中央表示明確支持造反派學生後，甘轉而支持學生，並對楊進行了揭發。1967年1月12日，寧夏造反派召開了批判楊、馬的大會。15日，楊、馬從北京被帶回接受群眾批判。楊剛下火車就被帶上牌子遊街^③。18日，陳毅接見寧大毛主席思想紅衛兵，明確提出楊、馬應被打倒。寧夏文官科層遂徹底陷入癱瘓。

在中央明確表態打倒楊、馬後，保守派群眾意識到自己「站錯了隊」。他們或重新改組，或改變組織名稱以適應新形勢。有些保守派組織甚至與造反派比激進，他們在喊打倒楊、馬的同時還加入了區黨委中許多其他幹部。這種行為體現了文革中群眾組織的盲從性和投機性。保守派群眾打出了造反旗號後，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變得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組織聯合起來反對共同對手是常見現象。

在中央明確表態打倒楊靜仁和馬玉槐後，寧夏文官科層徹底陷入癱瘓。保守派群眾意識到自己「站錯了隊」。他們或重新改組，或改變組織名稱以適應新形勢。保守派群眾打出了造反旗號後，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變得模糊，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對手是常見現象。

五 一月奪權——文革制度化的失敗

區黨委被打倒後，銀川陷入了全面的混亂。生產停滯，經濟主義風潮蔓延，同時在雙反運動中受害的幹部和群眾要求平反的呼聲日益增高。銀川出現的這種現象並不獨特。1966年底，全國各地因為地方黨委的癱瘓或半癱瘓都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這成了毛在1967年伊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正值此時，上海發生了造反派奪權事件。毛決定對上海奪權表示支持，並號召全國的造反派都起來奪權。毛的用意十分明顯，他想用造反組織來替代科層，從而將文革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狀態制度化。在中央宣傳機器的狂熱煽動下，全國上下都陷入了奪權的瘋狂中。

《寧夏日報》社造反派因其信息靈敏，早在1月13日就得知上海的奪權消息，他們隨即在本單位進行奪權。奪權風潮在銀川迅速擴散。在許多單位，奪權就是搶奪各單位公章和辦公室，許多人為搶公章大打出手。在各單位相繼奪權的同時，寧夏區黨委的奪權也被提到日程。區黨委的奪權是由甘春雷、區黨委造反派，和社會上的主要造反派領導協調完成的。1月中，甘讓區黨委造反派領導與社會上的造反派聯繫商討區黨委奪權事宜。1月17日，銀川十三個造反派組織開會討論奪權問題。會上造反派內部出現了分裂。首先是以北京為首的外地紅衛兵和寧大紅衛兵的矛盾，矛盾源於對權力分配的不滿和思想認識的不同。北京三司駐寧聯絡站強調寧夏奪權的時機還不夠成熟，寧夏文革還需要大混亂大動蕩。在北京紅衛兵的煽動下，中學生紅衛兵從大會退出。雖然如此，十三個

組織中的大多數同意聯合奪權。1月18日至25日，這些造反組織成立了「寧夏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起草了奪權公告，選舉了七名常任委員，並決定建立文革和生產建設兩個辦公室。1月20日，主要造反派領導去寧夏軍區尋求支持（此時毛已命令軍隊介入文革支持左派，所以軍隊的態度直接關係到新政權的合法性）。寧夏軍區派出副司令員張懷禮參加造反派奪權^②。

在造反派準備奪權的同時，打出造反旗號的原保守派群眾也在加緊準備奪權。迫於形勢，造反派只能在1月27日匆忙提前奪權。在軍區派出的士兵和寧大紅衛兵的保衛下，造反派奪了楊、馬的印章。奪權後，聯委會立刻進行遊行示威慶祝奪權勝利。倉促奪權並沒有結束銀川的混亂局面，相反它面臨着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首先是內部分歧。奪權後，為建立革委會，聯委會準備為在1960年的「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受害的幹部平反，並吸收他們加入新的權力機構（他們一直暗地裏支持着本單位的造反派）。但是這些幹部因受迫害的程度不同而對平反方式產生了不同要求，這些問題與群眾組織之間對革委會的權力分配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了聯委會的分裂。一些造反派退出聯委會，成立兩個新組織：寧夏總司和三司。這兩個組織的力量與聯委會比起來人少勢弱，但是他們卻削弱了聯委會的力量^③。與此同時，原保守派組織和奪權前退出聯委會的以北京紅衛兵為首的造反派組織組成了反聯委會聯盟。聯委會在反對力量的夾擊下根本就無法行使其權力。銀川所發生的一切並不特殊，毛並沒有給出一套具體的指示來指導奪權，再說，在爭權奪利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即使是毛有指示，也不見得會有效。這就使得奪權在大多數省份完全成了一場場無序的爭奪。全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朝着更壞的方向發展。

奪權後許多省份還出現了一個新現象：造反群眾開始衝擊各省軍區。這背後有兩個原因。首先，隨着運動的激化，軍事科層作為未被觸動的科層力量必然會成為攻擊對象。更重要的是，由於造反派中很多人是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奪權後造反派馬上要求銷毀地方權威整理的關於他們的「黑材料」。但是，許多地方黨委在這時已把那些重要檔案，包括「黑材料」，送到軍區保存。於是一些造反群眾試圖衝擊軍區以獲取這些材料。軍隊混亂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垮台，毛對此不能容忍。這迫使毛在文革中第一次對文革的發展作出朝着緩和方向的調整。1月下旬，毛禁止了造反派對軍隊進行攻擊，並下令軍隊支持左派。

寧夏奪權後，文官科層四分五裂，文革精神推到了極端，但是社會卻沒有向毛所期望的方向發展，而換來的是一片混亂。這迫使毛下令軍隊介入文革「支持左派」，試圖用軍事科層的力量來駕馭文革中的群眾運動。

六 毛的困境

（一）軍事科層還是群眾派性

奪權後文官科層四分五裂，文革精神推到了極端，但是社會卻沒有向毛所期望的方向發展，而換來的是一片混亂^④。這就迫使毛不得不下令軍隊介入文革「支持左派」，試圖用軍事科層的力量來駕馭文革中的群眾運動，並於2月下旬提出革委會應採取「三結合」（軍隊、幹部和造反群眾代表）的形式。但是，各地軍事科層與文官科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軍事科層對造反奪權有着本能的反

感。比起文官科層，軍事科層更為講究紀律和服從，因此他們在處理事務時往往更會遵守例行，壓制難以馴服的造反派，使整個社會朝着反文革的方向走去。軍事科層的這一傾向又使毛轉而支持造反派，對軍事科層施壓。可是毛一旦這樣做，整個文革又會朝着混亂的方向發展。在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間，毛的政策一直在保守和激進兩個極端搖擺，直至對造反派力量徹底失望，下決心鎮壓他所一手發起的造反力量為止。

軍隊的介入使得軍區對聯委會的態度變得十分重要。但是，寧夏軍區與區黨委關係密切。聯委會剛成立時，軍區對他們的支持純粹是迫於一時政治氣候不明。1月底後全國形勢往右轉。在這一背景下，寧夏軍區以一件很小的事件為藉口對聯委會施行了鎮壓：當時《解放日報》一名記者到銀川收集當地運動的情況，該記者的真實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聯絡員。他在採訪過程中因一些小事與聯委會下屬成員發生了爭執。盛怒中他來到寧夏軍區聲稱奪權太亂不應批准^②。軍區乘機改變了對聯委會的態度。2月8日，北京三司駐寧聯絡站從銀川郊區動員了一個由杭州下鄉青年組成的造反組織來砸聯委會。作為回敬，聯委會的造反派把三司駐寧頭頭趕回了北京^③。聯委會這一行動給軍事科層以鎮壓的藉口。第二天，軍區司令朱聲達召開會議討論一二七奪權是否正確。會上朱聲稱聯委會在奪權期間對其他群眾組織執行了白色恐怖和排外政策，「二八事件」充分暴露了聯委會的右傾本質。2月11日，寧夏軍區發表公告撤銷對聯委會和其奪權的支持。聯委會奪權十六天後流產^④。

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間，毛的政策一直在保守和激進兩個極端搖擺，直至對造反派力量徹底失望，下決心鎮壓他所一手發起的造反力量為止。

隨後軍事科層試圖將造反派從組織和輿論上徹底摧毀。2月19日，寧夏軍區發表「給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指一二七奪權是「在資產階級當權派甘春雷指導下的右派奪權」^⑤。之後，軍區以銀川清潔大隊的「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和中醫院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內部有「壞份子」為藉口解散了這兩個組織，並且關閉了寧大紅衛兵所舉辦的寧夏文革造反派展覽並沒收其材料^⑥，軍區主持的三幹會、公交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等都以一二七奪權為界，不准支持奪權的幹部參加。同時，軍區動員了保守派組織攻擊聯委會。奪權被標記為「甘春雷操縱下的右派奪權」，聯委會則被攻擊為「聯委會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在軍區的支持下，保守派組織聯合建立了「革命大聯合籌備處」^⑦。

在此形勢下，聯委會在3月7日發表聲明，要求與軍區通過商討解決分歧。朱聲達顯然不想妥協。作為回應，他稱三七聲明為「一小撮右派頭頭的陰謀詭計」，要求聯委會「交代罪行並交出他們的頭子甘春雷」。他並且動員了保守群眾發動一場「抓右派頭頭」的運動^⑧。此時，一批一直在幕後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走到了前台（大多數是在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受打壓的幹部）。他們成立了以區交通局王志強為首的「翻江倒海戰鬥團」，公開表示支持聯委會。寧夏軍區內部也出現了支持聯委會的聲音（如張元禮和劉德夫）。但是，造反派在這一階段基本上處於守勢，在軍區的壓力下，許多人退出了造反派。聯委會也不得不更名為「革命總指揮部」（簡稱總指揮部）^⑨。

造反派的受壓狀態隨着毛的政策在4、5月間的變動而發生了根本變化。暨反「二月逆流」後，毛對軍事科層對造反派的鎮壓，多次表示了不滿。4月初，中央軍委下達指令，正式取消軍隊對文革的控制權。毛的政策變化給寧夏造反派帶來生機。但是造反派的復蘇並未能夠擊敗軍事科層及它支持的保守派組織。

這其中有四個問題。第一，軍事科層和文官科層不同，軍人作風強悍。他們同時掌握着軍隊，造反派不可能將他們隨時抓來揪鬥。除非是毛的親自命令，否則他們是不會像文官那樣輕易就範的。第二，軍事科層是毛政權最為重要的支柱，軍隊亂了會導致境外敵對勢力的入侵，軍人急了會有兵變。因此毛不會像對待文官一樣對待軍隊幹部。第三，在十來個月的文革中不但形成了造反組織，而且還造就了一群與軍事科層有很大親和力的、同時也聲稱是在進行革命的原保守派組織。有了這批人，軍事科層的氣要壯得多。而對毛來說，「敵我」陣線已不像文革之初那麼清楚。第四，十個月的文革已把中國弄得天下大亂，各地問題不斷且問題性質不同，中央疲於奔命，顧此失彼。4月間毛的言論雖然給了造反派復興的機會，卻沒有對軍事科層支持保守派組織給予明確否定。這樣，毛在4、5月間的變化不但沒有壓垮各地軍事科層，反而造成了一個更嚴重的後果——各地造反派在毛的新動向鼓勵下咄咄逼人，原有的保守派在地方軍事科層的支持下也打着造反的旗幟，與造反派針鋒相對，派性武鬥在許多省份愈演愈烈。銀川的文革就這樣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各地軍事科層對造反派的壓制受到毛的批判後，朱聲達則堅持中央的方向轉變是中央文革的旨意，而文革小組不過是個辦事機構，並無決策權力，他強調中央軍委的指令給了地方軍區「自衛」權力。為了對付日益活躍的造反派，朱用召開貧農會的方式動員農民加入保守派，並動員農民進城攻擊造反派。他還指示籌備處到石嘴山、吳忠等地串聯，與當地武裝部建立聯盟。為了增加其統治的合法性，朱讓區黨委的老幹部加入軍區領導的第一線生產指揮隊^⑤。

進入5月，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了嚴重對峙。5月初，被軍區解散的兩個造反派組織要求平反被拒，同時，造反派紅衛兵在公安局前靜坐和絕食，要求收回寧大的文革展覽材料^⑥。朱拒絕作出讓步，與造反派針鋒相對。籌備處在5月底砸了新華社駐寧分社，認為它是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聯絡站。中央文革小組於6月5日和6日向朱發了三個指示，命令他嚴肅處理這個事件，朱不予理睬。同時，由朱支持的籌備處和地方武裝部在吳忠和石嘴山地區發起了武鬥^⑦。蘭州軍區命令朱改變行為，6月18日中央發令禁止軍區煽動農民進城搞武鬥。對於這些要求，朱都以中央和上級機關不明瞭地方情況為由予以搪塞，充分顯示了軍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氣質。面對進攻，造反派的行為也變得更加激進。7月19日，造反派舉行集會「聲討朱聲達在武鬥中殺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次日武漢七二零事件爆發。在江青「文攻武衛」口號的煽動下，曾任軍區副司令員的馬思義（在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被降職）在7月24日率領約四百人進攻保守派實力強大的吳忠，並佔據了吳忠儀錶廠^⑧。

籌備處於26日成立了寧夏大聯合籌備處，對外稱其成員達八十萬人，與總指揮部抗衡。與此同時，總指揮部準備對籌備處發起大規模的攻擊。7月底，因傳聞說西塔是籌備處的總部，總指揮部的兩個工人頭頭程學儒和劉青山率人攻打西塔，行動失敗，二十多名人員被俘。隨後，石嘴山一千二百多名礦工和鋼廠工人乘坐五十多輛卡車進入銀川支持總指揮部，當天下午他們攻下西塔。籌備處五人死亡，三百多人被俘^⑨。

攻下西塔後，總指揮部在銀川的實力佔了上風。但是，馬思義在率人攻入吳忠儀錶廠後被包圍，吳忠造反派告急。8月8日，總指揮部人員帶着長矛乘數

1967年4月初，中央軍委下達指令，正式取消軍隊對文革的控制權。然而這不但沒有壓垮各地軍事科層，反而造成了一個更嚴重的後果——各地造反派在毛的新動向鼓勵下咄咄逼人，原有的保守派在地方軍事科層的支持下也打着造反的旗幟，與造反派針鋒相對，派性武鬥在許多省份愈演愈烈。

百輛卡車往吳忠解圍。行至永寧縣大觀橋時，車隊遭到了籌備處的伏擊。槍是當地武裝部發的，而參與伏擊的人大多是復員軍人。總指揮部一百多人死在大觀橋，受傷者更多。大觀橋事件後，造反派開始從軍區搶槍武裝自己（實際上是軍區內的造反派讓總指揮部的人員拿槍）。銀川武鬥開始大規模運用熱武器。

8月13日，籌備處攻下吳忠儀錶廠，馬思義被打死。寧夏武鬥於是引起了中央的注意。為了結束武鬥局面，中央判定寧夏軍區犯了嚴重錯誤，朱被召到北京接受審查，第一野戰軍六十二師進駐寧夏。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康健民和六十二師師長徐洪學被指定為新領導。8月18日，蘭州軍區宣布總指揮部為革命造反派^④。形勢驟變使籌備處的群眾措手不及，他們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對野戰軍的進駐十分憤怒，於是就爆發了籌備處與六十二師間的衝突，並導致了青銅峽慘案。當時中央下令六十二師進攻在青銅峽守衛的籌備處武裝人員，造成籌備處一百多人死亡。從此籌備處走向衰落^⑤。

(二) 軍事科層和造反派的消亡

總指揮部在被確認為造反派後行為變得張揚。在單位中，總指揮部的成員對籌備處成員進行報復的現象十分常見。但是當時中央的政策是各派群眾大聯合，總指揮部因此失去了徹底搞垮籌備處的機會。在中央的操縱下，各派組織達成了協議，於12月27日宣布成立以新的軍區領導為首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⑥。

革籌小組成立後，韋伯的例行化機制重新啟動。雖然革籌小組的領導都是衝着支持造反派而來的，但是造反派的反制度傾向決定了軍事科層和總指揮部在蜜月後的必然衝突。他們的衝突起於革委會的人選問題。兩個問題成為焦點：一是甘春雷是否應進入革委會（軍事科層支持王志強）^⑦；二是寧夏四派群眾組織代表在革委會應佔的比例。軍事科層堅持四派席位對等，而總指揮部則認為造反派應當佔多數^⑧。這分歧導致了總指揮部內部的分裂。於是就出現了擁護新軍事領導的「小米加步槍」（米派）和擁護甘春雷的處於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布派）。1968年2月24日，革籌小組發下了一個革委會成員暫定名單以供討論。這名單激起了布派領導的強烈不滿：名單裏沒有布派支持的幹部、工人和紅衛兵代表。布派稱「名單沒有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在用修正主義篡奪文革的勝利」。迫於壓力，以康健民為首的革籌小組在名單中加入了布派的主要領導^⑨。

然而，軍方在妥協的同時，暗地裏動員米派指責布派攻擊革籌小組。作為回應，布派在3月2日聲明群眾大聯合和未來的革委會必須以革命左派為核心，甘的問題必須適當對待。聲明發表後，布派的一個激進下屬組織成立了「肅清叛特反資聯絡站」，專門進攻米派，布米兩派之爭開始深化。儘管分歧很大，但是在中央的督促下，寧夏革委會還是在4月10日宣告成立。

然而，1968年3月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影響下，毛對文革的形勢再度不滿。如1967年3月一樣，毛感到軍隊對文革中混亂形勢的緩和走過了頭，於是發動了「反擊右傾風」運動。4月12日，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反右傾風運動的執行。「反右傾風」為布派提供了良機。在會議上，布派領導批評了革籌小組的右傾保守主義。康健民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評並宣布歡迎甘春雷回來。運動轉向後，軍方試圖把鬥爭的矛頭轉移到影響力已經很小的籌備處身上，但是布派則力圖打

革籌小組成立後，韋伯的例行化機制重新啟動。雖然革籌小組的領導都是衝着支持造反派而來的，但是造反派的反制度傾向決定了軍事科層和總指揮部在蜜月後的必然衝突，而衝突起於革委會的人選問題。

擊軍方領導和王志強，從而獲得對革委會的控制。布米之爭繼續深化，武鬥再度爆發。5月2日和7日，固原地區爆發了布米兩個下屬組織的武力衝突。同時，銀川米派兩千多人攻擊了布派以劉青山為首的「八八交通兵團」，並發生了武鬥。5月23日，劉又進攻米派作為報復^④。

軍區領導決定利用米派徹底搞垮布派以恢復秩序。6月1日，在紀念聶元梓大字報發表二周年的大會上，康健民指出在前兩個月的反右傾運動中，存在着一股極左風干擾着運動的大方向。第二天，在軍區的操縱下，米派一個下屬組織砸了布派控制的工人代表大會的牌子。6月9日，米派的幾個下屬組織發表了「六九聲明」，指出布派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寧夏的第二套班子」。軍隊領導立刻表示支持，並聲稱要用六九聲明統一寧夏的兩百萬人民。面對進攻，布派於6月13日發表聲明稱，目前運動的任務仍是「反右」：「六九聲明是分裂革命陣營，顛覆紅色政權」。但是，布派錯估了形勢。兩年的文革使中國變得滿目創傷，毛作為當權者的一面使他深深地認識到了群眾運動的可怕，他已經完全沒有了兩年前的豪氣。在銀川武鬥加劇的同時，全國各地在相似的背景下也再度出現混亂局面。7月間，毛不得不轉而支持軍方。

軍方在毛轉向後對布派發動了強攻。8月，軍方領導的工宣隊進駐各單位，各單位革委會裏的布派領導被清洗。8月底，按照中央的指令，寧夏的四大派組織都被解散。9月9日，軍方將布派定性為反革命組織^⑤。此後在寧夏革委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中，布派的領導都在遭到批鬥後被打倒^⑥。一場反科層的克里斯瑪運動以保守的軍事科層統治結束。韋伯就這樣擊敗了毛。

在銀川武鬥加劇的同時，全國各地在相似的背景下也再度出現混亂局面。至1968年7月，毛不得不轉而支持軍方。一場反科層的克里斯瑪運動以保守的軍事科層統治結束。韋伯就這樣擊敗了毛。

註釋

① 如：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84);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phraim Fischoff et al.,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111-48.

③ 對這種克里斯瑪形態的分析可參考Arthur Schweitzer, *The Age of Charisma* (Chicago: Nelson-Hall, 1984)。

④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18。

⑤①③②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編：《中共寧夏黨史大事記：1925.8-1988.6》（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頁350；351-52；355；359。

⑥ 第45號被採訪人。

⑦⑧①③② 寧夏地方文獻館收集：《寧夏各種小報彙編》（銀川，1967）。

- ⑨⑩ 第40號被採訪人。
- ⑫ 第21號和第42號被採訪人。
- ⑭ 第42號被採訪人。
- ⑮⑯⑰⑱ 寧夏大學聯合指揮部材料組編：《革命造反有理：大字報選輯》，第一集（1967年4月），頁5-7；40-48；20-30；48-54。
- ⑲ 第46號被採訪人。
- ⑳ 銀川工業薄弱，黨政機關和文教系統的造反派因此在銀川文革中始終起着領導作用。
- ㉑ 寧夏在1960年曾發動過如下兩場地方性政治運動：「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於1960年上半年在區黨委中進行，以劉格平為首的老區黨委領導班子被認為是「搞地方民族主義」被罷官或降職，由以楊靜仁為首的新領導班子代替；以消除地方民族主義的社會根源為名，1960年下半年寧夏黨委在社會上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壞人壞事運動」，大量群眾遭到了迫害。這兩場運動在幹部和群眾中留下的傷痕是影響寧夏文革的一個重要因素。
- ㉒ 大江東去：〈人間正道是滄桑〉，1967年4月27日，頁7。收於銀川工業系統無產階級革命派指揮部編：《論寧夏一二七奪權：大字報彙編》，第二集（1967年7月15日）；第30號和第38號被採訪人。
- ㉓ 銀川市工業系統捍衛毛澤東思想聯絡部編：《發揚「一二七」革命造反精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字報彙編》，第一集（1967年3月），頁1-4。
- ㉔ 他們同時反對造反派和保守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 ㉕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72。
- ㉖ 第30號被採訪人。
- ㉗ 過大江、紅雨：〈不廢江河萬古流〉，1967年5月30日，頁5-7。收於《論寧夏一二七奪權：大字報彙編》，第二集。
- ㉘⑳㉙㉚㉛㉜ 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編：《寧夏回族自治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1968年元月27日），頁103-108；116-20；103-106；105-106；91-93；96。
- ㉝ 第29號被採訪人。
- ㉞ 中共銀川市委黨史研究室、銀川市檔案館編：《中共銀川黨史大事記：1949.9-1996.12》（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頁112。
- ㉟㊱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編：《中共寧夏黨史大事記徵求意見稿》，頁29；30。
- ㊲ 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編：《寧夏回族自治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頁85-86；第18號採訪人。
- ㊳ 甘曾積極參與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所以甘與王雖都在總指揮部內，但舊怨仍深。甘想讓原區黨委的一些幹部進入革委會，王則大力反對。新軍區領導鑒於甘與舊黨委的深厚關聯而偏向於王。這條信息由第30號被採訪人提供。
- ㊴ 以下敘述主要是建立在寧夏革委會編輯的史料《寧夏文化大革命兩個階段，兩條路線鬥爭的重大事件記載》（1974）和對當事人採訪基礎上的。
- ㊵ 《寧夏文化大革命兩個階段，兩條路線鬥爭的重大事件記載》，第一部分〈從407號文件發表到區革委會成立〉。
- ㊶ 同上，第二部分〈從區革委會成立到「六九聲明」發表〉。
- ㊷ 同上，第三部分〈從「六九聲明」到二擴會召開〉。
- ㊸ 同上，第四部分〈從二擴會召開到黨的九大〉。

武麗麗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趙鼎新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北美社會學家協會會長。